

華教運動

反思新纪元学院发展文集

動或不動？

刘镇东 著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出版

華教運動

反思新纪元学院发展文集

動或不動？

刘镇东 著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出版

校友会丛书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

Whither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作者 / 刘镇东
编辑 / 张淑玲、刘国伟
文字校对 / 杨洁、张淑玲
鸣谢 / 新纪元学院、曾维龙

封面与排版设计 / REFSA

字体 / 宋体 (10.5 pt)

出版与发行 /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Blok A, Tingkat 2, Wisma Wenworth KL,
Jalan Yew, Off Jalan Pudu,
55100, Kuala Lumpur.

 603 - 9281 8105

 newera-alumni.com

 newera.alumni@gmail.com

 New Era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印刷 / Vinlin Press Sdn.Bhd. (25680-X)
No.2, Jalan Meranti Permai,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版次 / 初版第一刷2011年1月
初版第二刷2012年4月
初版第三刷2013年7月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Liew Chin Tong, 1977-

[Hua jiao yun dong, dong huo bu dong?]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 / 刘镇东著

ISBN 978-967-10173-0-2

1.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Malaysia--Political aspects.
2. Education, Higher--Malaysia--Political aspects. 3. Schools,
Chinese--Malaysia--Political aspects. I. Title.
378.595

Copyright © LIEW CHIN TONG 201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本书内容在未获得出版者与／或作者的许可下，不得翻印、存档于供载取或任何形式的转传：包括电子、影印、录影、或其他复制形式。本书内容不代表出版社立场。

本书若有破损、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出版社更换。

编序

张澍飧、刘国伟

从过往迄今，马来西亚的确需要一所中文大学。这个需求不应该是民族主义式的，只为了标榜和突显华裔族群之强大而存在。相反，它是为了突破巫统领导下的狭隘且单元的教育思维和制度，重新落实宪法保障公民应有的基本母语受教权。换言之，支持建设中文大学的人理论上也应该捍卫其他语言源流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和权利。对于母语教育权这样的需求，我们从未改变。

不过，从华教运动过去的历程来看，我们仿佛也逐渐地体悟到，单纯以母语作为突破单元教育霸权的手段，将会处处碰到局限和困境。我们鲜少看见华教运动组织者能对相关的教育问题提出更深刻的反思，更遑论它与其他语言源流运动组织建立起长期积极的运动伙伴关系，共同创造和引领具前瞻性的议题。

事实上，我们经常误把母语教育当作是唯一的且终极的目的本身，而忽略了教育其他同样重要的面向，以致于限制了华教运动或母语教育公民运动发展的其他可能性。随着时态变迁，中文大学所面对的客观环境的挑战是更复杂的；同时社会对于它的期待和想象，也应该是更多元的、更异质的。问题在于，新纪元学院是否愿意诚心地面对这些内外部的声音？

首先，我们鲜少警觉并讨论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可能负面影响。工商管理、会计、工程、媒体传播、商业广告

设计等这些看似琳琅满目的教育课程，已成为当代年轻人对未来志业和生涯发展的有限想象。世界市场一体化后，马来西亚作为半边缘或边缘国家，经常必须无条件地接纳和满足新国际分工的生产需要。为了衔接以西方为主的跨国企业发展需求——建设生产基地和扩张消费市场，我们一方面需要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同时也要提供二阶的、技术性的管理者。马来西亚政府和社会也对此趋势乐此不疲，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误当这种“专业人士的生产模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

在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潮下，盈利导向、专业分工等使全球高等教育沦为一种商品的困境，深深地扼杀了大学教育作为培育学子成为全人的崇高信念。在这种竞逐教育均质标准化的狭隘思维下，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发展图像也无一幸免。1980至199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开放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管道和机会是变多了、变得更容易了。可是，在这些众多的教育商品中，它们有什么不同？

再者，政党政治和国家机器凌驾于高等教育体制之上，使学术教学与研究经常必须屈服于当权者的威权之下，使高等教育同时夹杂在学术资本化和学术政治化的两难之中。新院存在的目的和价值，除了基本的母语教育权，更有赖于它是否勇于看见上述种种歪七扭八的发展趋势所促成的迫切角色，并乐于承担之。换言之，取得学术评鉴机构的认同是否这般重要，实在值得我们一再地商榷。

回想起当初有机会能够一口气地阅读镇东这一系列文章，刚好是2008年10月的新纪元风波。若将这些文章，与新纪元逾十年的大专教育发展相对照，心里难免有些唏嘘，原

来狗吠火车的史迹早有开始。他这些年来的论述核心其实清晰透彻：我们要走出南大模式，破除筹办三院九系、综合大学的迷思；新院无法与政经力量雄厚的私立学院或大学相提并论，因此要放弃雪邦计划、不要盲目参与土地建筑与人数扩张的游戏，反而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注在学术建设之上。

大学的性格是由参与者本身来决定的。它的发展取决于它所招来的人。这对于目前仍然受困于二、三年学院制的新院而言尤其如此。当学生匆匆地来了又去，师资本身就成为了相对稳定的知识创造和延续的重要凝聚点，关键地影响着各系乃至经常立志要作准大学的新院的发展样态。但是，回首新院十余年的来时路，单就一个学院机构最基本任务——学术知识发展来看，我们到底是建设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我们需要一个相信知识而非崇拜资讯的社会。大学提供的知识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耕发芽，并能够回馈给社会运动和发展，使两者可以产生对话并造成冲击的可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纯粹是经济利益的发展）。我们或许未能立即判准新院的成败，但我们可以看见新纪元学院长期存在的困境——仍未能为中文知识社群建设出一个知识汇聚、积累和延续的重要基地。反而，因其过去和现在的主事者对大学教育的有限想象，使新院屡次因人事权力斗争而遭到重创、反复掉落知识断裂的状态之中。我们只要列出新院创校以来，最终选择出走（不管是自愿、被迫或无可奈何的）的师资队伍名单即可一目了然。

只要细看这些文章所主张的、诉求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理解2008年新纪元风波所牵引出来的纠缠斗争，不是新的问

题。如果这些文章所急欲发出的声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狗吠火车的话，就让这本书的出场，成为我们重新开始反思如何建立一套评价边缘声音的标准。此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我们要看见在多重权力宰制的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结构下，新纪元学院应该要去承担的角色。对于这样的学术知识追求和建立，在马来西亚社会的脉络中，并不是象牙塔式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而恰恰是政治性的。

每每聊起出版此书的缘由时，刘镇东总是说，希望能够跟新纪元学院告别。新纪元风波促使许多校友广开言论，不少年轻校友在此次风波中所表述的文章都比当时两造主权者更具前瞻性，足可见新院校友中可用之才大有人在。这次新纪元校友会希望能够集结这些文章，更是希望达至一种抛砖引玉的效应，集聚散落在各领域的校友，创续和经营另一个新平台。这是此书现身的目的之一。即使看似狗吠火车，刘镇东这些年来文章书写，恰恰反映出两种精神：一，他的锲而不舍让身旁的我们学会警觉，不要轻视自己的年轻，要相信自己；二，我们不需要盲目崇拜知识，但要趁年轻时将自己投身在知识之中，一直坚持到某个深度和广度，才能一点一点地看见另一个社会的可能。

(2010年6月3日完稿)

序一： 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再省思



潘永强

据一位南大老校友的说法，当年李光耀曾经说过，南大前五届学生都是华校优秀人材，所以精英辈出。李氏有没有真的这么说过，尚待查证，但在南大早期的学生群中，确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难怪李光耀也为之侧目。或许南大生过于优秀和精彩，成为人民行动党政权的隐忧，才种下后来覆亡的结果。

新纪元学院创校仅有十一年，现在就要评说校友的成就，还是言之过早，但建校初期的第一代校友，总体而言确比现在的学生素质更佳，也更有想法，这是不在话下的。新院在初创时克难办学，但校园气氛却相当健康单纯，师生之间还留下一些优良传统，但随着时间流逝，加上一场风波重创之后，本来还保留的些许好风气，也逐渐淡化流失。

19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高教政策的松绑，新纪元学院在经过无数人的努力，终于获准设立，它被视为华文教育新纪元的起点。可是讽刺的是，这个“新纪元的起点”仅仅限

于学院启航开办而已，至于关乎华文高等教育应有的方向和理念，以及大学制度的长期规划，并不见得有着细致专业的构想，仍然是在模糊中探索。

本来只专注于中小学教育的机构，现在竟要负起建设一所高等院校，这个任务是何等艰巨？它需要全新的专业、庞大的科研资金，也要招揽众多的强将与良材，我们都准备好了吗？贫乏和片面的大学经验，令我们轻视了以上各种要素的重要性。说一句实话，办大学不是请客吃饭，当时许多参与者都缺乏开办大学的能力和识见，在起步时就跌跌撞撞，以后要顺利站稳脚跟就倍加艰辛。

事实上，即便在全国范围内，在高等教育办得七零八落的马来西亚，也缺乏值得效法和参考的成功办学经验，能够参照的确实不多。国立大学破败保守，私立大专盈利导向，民办的新纪元学院究竟要走出一个怎样的模式，仍是一片空白，只能边做边学。

可是放眼周边地区，香港科技大学在成立十年之后，就崛起为亚洲一流名校，水平可以跟美国州立大学比美，它的前任副校长孔宪铎后来著书回忆这一段创校历程，总结一个心得，就是好的大学不只要吸收优良人材，还要让人材愿意留下来(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要留住人材，就需要一套合理和健全的大学体制。

可是，马来西亚华人 / 华团只有办小学和独中的经验，完全缺乏对优质大学的想象，以及对现代大学体制的正确认识。大学校园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社区，不是平庸和无知的角力场。大学的尊严来自对学术和专业的服膺，而不是

被反智叫嚣所掩盖。优质的大学是要厚植社会力和知识力，还是围绕在招生人数和盈亏数字上打转，或者，一所有明确使命的民办学府，要适当地抗衡国家官僚霸权的节制，抑或无条件地对不利的官僚牵制彻底臣服、照单全收？这些在办学过程中遭遇到的挑战，都应该理性的加以讨论。就它们被提出来讨论的方式和态度而言，也大致可以检视办学者的格局和视野。

其实，民办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应该对保守和压抑的教育体制作出回应，进而提出进步的、创新的，以及多元的替代选择，这才是社会集资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初衷和动机。

如果民办教育跟既有的教育体制面容相近，乃至同样保守、封闭以及趋于单一，没有自己独有的灵魂和生命，它不只无法为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复制出同样的教育思维，这般的民办高等教育模式，无疑就是失败的尝试，也浪费社会资源，并不值得动员集体的力量继续资助。

这里可以举香港树仁大学为例，说明这一点。树仁学院在1971年由一对退休律师夫妇创办，坚持以国际主流的四年制办学。在港英政府年代，该校曾两度被游说，转行英式三年制，若同意改制即可获得资助。但办学者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反而公立的大学一直在“四改三”、“三改四”之间反复不定。直到2006年，就在一片恢复大学四年制的声浪中，港府终于宣布树仁升格为大学，结束了一场三十年的教育理念之争。树仁创校人宣称：“人家承认固然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承认自己”，这才是民办教育（无论是大学或独中）应有的品格和信念。

如今，在我国要办一间私立大学，已经相对容易，要办一所有盈利的私立大学，也并不困难，而类似的大学不是过少，而是过多。可是，一所彰显国家多元文化价值、培养社区领导人材、厚植社会力量的民办学府，则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它的存在已不只关乎民族教育，而是关系到教育理念的多元选择。

本书作者刘镇东先生，从就读新纪元学院开始，到出国深造回来，都是一位有独立见解，擅长政策思考的优秀青年，他可谓第一代的新院人。多年以来，他都对母校新纪元学院的发展规划，提出许多深刻的观点和尖锐的批判，直指问题核心。

可是，在浮躁与短视的马来西亚华文社会中，他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众多议论，却甚少获得回响，遑论良性的互动与讨论，即使经历过一场新院风波后，我们社会似乎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和讨论，也看不出有何长进，对高教问题的研究依旧匮乏。

如今，刘镇东先生将他这方面的文章结集成书，我相信，这本小书是讨论我国高等教育的极少数华文著作之一，也把许多一度被忽略的重要问题，重新提出来省思。这些文章不只有他的思考痕迹，也是他成长的轨迹，还伴随着新纪元学院各时期的发展转折，非常值得推荐。如果我们对民办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教育政策，有更多像这样的冷静观察，就必定能丰富国内的教育改革论述，对教育政策的输出也有所帮助。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邦咯岛）

序二： 永远的 “华教执政党” ？



曾庆豹

镇东出版其文章札记，徵询我同意將於1996年4月21日刊载於南洋商报的〈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编注：此文可见本书〈附录〉）收入於其作品中，并邀请写一篇序言，我毫无怀疑的答应了。

讽刺的是，拙文写於“上个世纪”，且文经十四年载，仍被关注，对我而言绝对不是一件高兴的事，这说明了十四年过去了，我们也走过了“新纪元”的十个年头，华教运动究竟是动还是不动，这不免又是一个值得被提及的问题。当然，问题也许仍旧悬在那里，但并不表示华教裹足不前，也许又历经时间的变迁有了新的问题，或有些问题已自然蒸发，无论如何作为认真面对华教教育的本质的人而言，“华教运动，动或不动”绝对是一个严肃而无以回避的老问题。

据说，拙文刊出以後，华教有关当局曾私下组讨论会，目的是为了“捍卫华教”，不容“局外人”惹事生非；由於害怕引来更多的争论，所以基本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也就是

不回应，不作为。无疑的，拙文早已被视为华教之“异端学说”，甚至把我归类为“汉奸走狗”之类的，至今，我还真的没有接收到任何来自於华教有关当局愿意与我面对面沟通的邀请，至少他们也应反驳我，可惜，这种现象并未发生，显然，有关当局没有相对的“思想武器”来应对，或者他们从来就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困境。

重新阅读拙文，我潜在的问题即在於指出了华教“运动”的本质即在於它的矛盾（民族与国族的冲突），但问题在於他们没有利用自身的矛盾。事实上，华教运动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但我认为林连玉是一个充份使用此一矛盾的人，但之後其追随者就缺乏了这种感觉，甚至想以消弭矛盾的方式来保障其在华教运动中的地位。一个没有“能力”利用其矛盾现实的组织，就是“死亡”，也就是“不动”。

大体上，华教的代表性机构在华人社会里就像是执政当局，他们享受着华人社会给予他们“民族认同”的安全感，尤其是“国中生”给予华教奇特的认同，更是说明了华教从来就不存在着矛盾的感受，华人社会就是华教的安乐窝，华教当局就怕惹事生非，认为这些都是打扰他们安享於自身王国的因素，所以华教当局越来越把华教当作“做功德”或是一种“慈善事业”，这些都足以让华教“永垂不朽”，他们哪管“动或不动”的问题，一动不如一静，十足官僚心态。不是吗？

下一次大选有可能会换执政党，我想问：华教会换执政党吗？还是只是换一位执政党的主席而已？

自序： 告别新纪元



刘镇东

这是最难下笔的一篇稿子，耽搁、迟疑了好久。告别，毕竟是伤怀的。告别的，不是记忆中的新纪元学院的人、事、物。告别的是，作为社会运动的华教运动。告别的是，作为理想大学的新纪元。

失去社会运动张力的华教，就只剩下曾庆豹1996年所说的上班打卡的官僚体系。失去理想性格的大学，和其他发文凭卖学位的学府就没有什么不同，新纪元学院也就可有可无。

学术自由受到严重钳制的国立大学，存在的目的是执行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操弄，私立学府则为了盈利，目的清楚不过。新纪元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吗？

我理想中的新纪元，是汇聚拒绝被体制收编、抗拒私立学府的盈利逻辑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阵地（葛兰西语），也是通过文理学院式(liberal arts college)的人文教育滋润新一代

的学术重镇。作为社会运动的华教运动，在尊重学术自由之余，可以从大学吸取新思考的养分，可以深化运动的知识基础，可以和其他社会运动作连结。

可惜的是，新纪元这些年的注意力都耗在大楼的建设、学生人数的多寡、政府认证的速度、财政盈亏等与知识本身没有太多关联的琐事上。在主事者的思维当中，南洋大学是典范，误以为21世纪是1950年代，全国就只有一所南大。他们不知道原来在收生时，新纪元学院要与世界各国的学府竞争最好的马来西亚学生。我们只是升学学生的大学星图中，其中一颗不太耀眼、渺小的星星。南大因有三院九系，新纪元最初也开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系（中文、资讯工艺、商学），尔后则是越来越多的科系、学生、建筑，还有雪邦校地的辩论。大学的理想就这样陨落。

作为一名参与者，个中的遗憾与失落，难以言喻。从踏入新纪元学院的那一刻起，我以新纪元学院和华教运动的参与者自居。董事们捐款参与华教、行政人员和讲师领着工资参与学院的工作，新纪元的学生自掏腰包缴学费之余，拿出最美丽的年少岁月，以生命来参与新纪元学院的实验。

这本小书是我们全力以赴参与的实验，最终失败的检讨报告。2003年，新纪元学院开课五年，在我们看来无望活出理想性格之后，邢诒旺、李益南和我架设《真纪元》网上杂志，思索新纪元对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意义。于我而言，写完那一系列的文章，算是向自己在新纪元的日子的交代和告别，从此不再过问新纪元的事。

本书几乎所有文章都是这个时期书写，部分曾在《东方日报》的专栏刊载。当中的文字，有着很深的“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决定结集成书是2008-2009年新纪元学院风波期间，发现论述的“不长进”，深觉有必要再次呈现曾庆豹1996年和我们2003年的文字。2009年1月接任新纪元学院校友会会长，我希望校友会可以领导关于新纪元、华教、乃至社会改革的舆论，《华教运动，动或不动？》的出版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关心华教运动前途的朋友共同探讨路在何方。

巴基斯坦籍旅美伊斯兰研究泰斗法如斯（Fazlur Rahman）（1919-1988）曾严厉批判有千年历史的埃及奥阿兹哈（al-azhar）大学的教育制度，引起保守派激烈反击。法如斯和反对他的人都很清楚，关于奥阿兹哈的讨论，其实就是关于伊斯兰本身的讨论，是关于伊斯兰的知识、意识和理念如何形成、诠释与阐述。无可避免的，关于新纪元学院理想陨落的讨论，就是关于华教运动失去方向的讨论。

从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告别新纪元就是要超越新纪元、超越华教运动。新纪元、华教运动不应该是新纪元校友和我的终极关怀。我们对大学的关怀在于知识的发现与传播，我们对华教运动的关怀发源于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华教的遭遇，只是不义的其中一种表征。

新纪元学院曾经有过刹那间的理想性格和无限潜能，对于我追求知识、寻求社会正义，有着深远的影响。黄琦旺师与同学茶叙时提问的种种，激起思维的千层浪。在她的引领下，阅读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和林开忠的硕士论文，即

后来由华研出版的《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从林开忠的论文认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布》一书。安德森的各著作是我在澳洲国立大学第一年的阅读重点。

詹缘端师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灵活解说，有别于马来西亚部分华裔知识界（如一些在董教总、独中、报界、“马华文学界”的朋友）依循五四—鲁迅—左翼传统，认为儒家一无是处的姿态。他对《论语》和孔子的世界的理解、对于礼的看法，多少还影响我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当谈到影响他的国学大师们穷一生追求学问“继往圣之绝学”/“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格特质、书院式讲学与对话，成了我当时对学者典范的期待。也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图书馆语重心长要我趁年轻时多读书和“沉潜”。

为了抗衡学生事务处主任张永庆把新纪元当中学辅导课来办的狭隘想法，董总职员钟伟前和邱金明成了学生会和我的军师。我提出校园共治的说法，即校园是行政、学术、学生、校友、社区共同组成，行政只是其中一环，原初是伟前的想法。张永庆定了个“学生自治会”的名字，伟前和金明替我们出点子，举办学生公投把“自治”两个字删除。学生会与学院针对《学术备忘录》（见本书第17页）对话，李万千在401会议厅遥远的另一端指着我说，“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嚣张的学生”，金明到我的宿舍来安慰我说，“李万千在南大图书馆与李光耀争论的时候，李光耀心里也大概作如此想”。已故诗人游川曾以Robert Frost的诗告诫我：“我年少时不敢当激进派，怕老来成了保守派”（I never dared to be